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王晓秋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晓秋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ISBN 7-80149-228-5

I. 戊… II. 王… III. 戊戌变法-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248 号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 编: 王晓秋

责任编辑: 徐思彦 杨 群

责任校对: 昆 鹏

责任印制: 问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7.75

字 数: 76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228-5/K·020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国史学会戴逸会长的开幕词	(1)
北京大学何芳川副校长的欢迎词	(8)
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虞和平 (1)
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戊戌维新 性质的再认识	郑永福 (18)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李双璧 (26)
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	孔祥吉 (38)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黎仁凯 (56)
戊戌变法与立宪运动	邢丽雅 (70)
戊戌变法与皇帝角色的新界定	[澳] 沙培德 (84)
戊戌维新运动和中国近代文化	史革新 (100)
戊戌兴西学活动与文化结构的更新	汪林茂 (113)
清季诗史中的戊戌维新	刘学照 (132)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张 越 (148)
“心学”与戊戌维新运动	吴雁南 (160)
论戊戌维新派的婚姻观	梁景和 (172)
维新运动前士人立身观念的演变	李长莉 (181)

2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朱 英 (196)
论戊戌维新时代关于“习性”改造的构想 及其意义	杨念群 (209)
戊戌维新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李华兴 (223)
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	王晓秋 (237)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	〔法〕巴斯蒂 (253)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考辨	阎小波 (265)
戊戌时期的学会 (1895~1898)	张玉法 (278)
务农会在戊戌变法运动史上的地位	〔日〕伊原泽周 (293)
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	容应萸 (311)
北京宣南士人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戊戌维新 ...	刘桂生 岳升阳 (328)
北京会馆与戊戌维新	〔美〕白思奇 (340)
天津维新运动与近代文明的构建	陈振江 (348)
维新变法与澳门	汤志钧 (358)
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	郭双林 (375)
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 ——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	李廷江 (390)
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	陶德民 (403)
德国对戊戌变法的反应	〔德〕费 路 (421)
普鲁士改革与戊戌维新之比较	郭少棠 (435)
梁启超对韩国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韩〕辛胜夏 (444)

戊戌维新在新加坡的反响

——以《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 段云章 (457)

关于保皇会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运动

——以谭良档案为中心 [美] 谭精意 (473)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房德邻 (486)

评康有为由上而下体制内的渐进革新思想 林家有 (496)

康有为与孔子纪年 [日] 村田雄二郎 (509)

理学与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 吴义雄 (523)

“翁同龢荐康”说质疑 马忠文 (540)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邱远猷 (551)

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问题 [日] 狭间直树 (567)

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 耿云志 (576)

谭嗣同与盛宣怀 贾 维 (589)

严复与戊戌维新 蔡少卿 (607)

试论严复的人口思想 胡绳武 (622)

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 俞 政 (639)

严复与卢梭思想关系之新见 蔡乐苏 (654)

容闳与严复——参加戊戌维新的西洋留学生

..... 戴学稷 徐 如 (671)

戊戌变法前后的蔡元培 蔡建国 (683)

戊戌维新与张元济 张人凤 (695)

张謇与维新运动 苑书义 (709)

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 谢俊美 (721)

4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张之洞与戊戌维新	冯天瑜 (731)
张荫桓与戊戌变法	李吉奎 (747)
戊戌时期的端方	尚小明 (758)
旧中有新：戊戌前后王先谦与叶德辉 对国情的认知	罗志田 (771)
预备立宪时期康梁派与清朝统治集团的关系	李永胜 郭卫东 (784)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	郭世佑 (797)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杨天石 (816)
戊戌维新百年研究述评	马洪林 (831)
近二十年来的戊戌维新图书出版概况	陈 铮 (848)
戊戌变法档案简介	秦国经 (860)

□ 虞和平 □

论戊戌维新在中国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下同）的进程，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次阶段，戊戌维新使它开始进入制度层次阶段，五四运动使它转变为文化层次阶段。这种说法，就这三次运动的主体目标取向而言不无道理，但是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这三次运动的实际成效而言并不全面，亦非尽然。从戊戌维新的实际成效来说，它作为一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是不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一 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无需赘述的。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知识的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

维新派的传播而学活动，最注重的是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他特别注意传播科学精

神和民主原则与实现国家富强的关系，指出：西方各国富强的关键，不是工于技巧，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过“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①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科学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解释说：“西学格致”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源，他认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更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②

对这种科学精神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胜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

^① 王拭主编《严复集》，第2页，中华书局，北京，1986。

^② 《严复集》，第45、11、43页。

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凡其耕凿陶冶，织任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轻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他又用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如果不懂这些科学，就“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其结果就不能掌握和运用好群学，“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①

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这种科学精神。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并提出“士以智为先”^②；“人道以智为导”，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③。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④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能致国富强，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在于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不仅用“子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道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而且认为实现这一原则的关键是人际关系的自由平等。他指出西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

① 《严复集》，第45、22~23、559、6~7页。

② 《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517、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

③ 《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837页；第1卷，第191、13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4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

利，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根本。他说：西方人认为“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由此便产生了包括“平等”、“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二是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子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①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这种原则和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屡屡战胜中国，是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人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是没有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不仅君民之间贵贱悬殊，而且把人民当做“天之廖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且中国的人际关系，只“知损彼之利为己利”，所以“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②

其他维新人士亦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

① 《严复集》，第3、11、30—31页。

② 《严复集》，第36、12、15页。

“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① 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②

维新派在传播西学的同时，还以西学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无用”之学、“无实”之学。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他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③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也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对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不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能够促进社会由蒙昧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从而摸着了现代化的真谛所在。

二 戊戌维新与人的现代化

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之具有现代化建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9页，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影印本。

③ 《严复集》，第44、46、558—559、1031—1032页。

设的能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戊戌维新于此不仅发出了第一声呼喊，而且开始了实践尝试。

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思想，都提出更新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转贫弱为富强的治本之法，即“本原”，否则，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之法，且很难取得良好而稳固的效果。

严复的“三民”说，明确提出了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在理论原理上，他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类的生存竞争，使“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①。他又以国民的发明创造力说：“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②最后他从国家群体由国民个体组成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并作下述具体论述：

一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

二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是争取国家富强的治标之举，而提高国民素质则是治本之举。他认为洋务运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不能实收其效”，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使“上作而下不应”，“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

① 严译丛刊本《天演论》，第38页。

② 《严复集》，第514页。

行”。因此，“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三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一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①

其他维新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没有严复那样全而深刻，但也各有独到之处，特别对开民智尤为重视。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把集群开民智作为维新的本原所在，而变法只是维新的具体措施。他曾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②他又认为议会政治的实行要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否则“遽用民权”，必无良好之结果^③。梁启超在吸收严复“三民”说和总结戊戌维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度宣传提高国民素质在争取国家富强中的决定性作用。除了论述以“开民智、振民气、新民德”为主的“新民”概念和方法之外，他进一步强调其必要性说：“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对于改革内政，“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对于消除外患，如果“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④。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是要提高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素质，以适应实现国家富强的需要。对此，严复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

① 《严复集》，第25、26~27、14页。

②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戊戌变法》第4册，第385页。

③ 参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第11卷。

④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5页。

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鼓民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手足体力”，即身体素质。此乃国家富强之基础，各国“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开民智就是要养成和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此乃“富强之原”，只有使国民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之后，国家才能富强，“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新民德就是更新和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使其改变各私其私、不重信用的传统道德本质，树立讲究“言行信果”、“各私中国”（即爱国）的道德观念。此乃“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救国图强的必由之道，“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①由此可见，严复的“三民”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梁启超“新民”说的内容体系更为全面。在鼓民力和开民智方面，延伸了严复的思想，把“力”的内涵从体力扩展到“心力”和“胆力”；以传播西学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新民德方面则颇有发展，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②，除了对树立国民公德意识和爱国精神详加论述之外，还提出了自尊、上进、毅力等国民道德建设的新概念。其他维新人士，虽没有如严复、梁启超那样系统而深刻的见解，但也认同严、梁的“新民”内容，这在他们的学会活动中多有体现；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谭嗣同的《仁学》，把“力”的内涵进一步细分为 18

① 《严复集》，第 18、27～28、29、31—32 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 15 页。

种，如“拒力”、“锐力”、“韧力”等^①。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三民”学说对人的现代化意义，还表现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即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去改善国民素质，把掌握科学的知识和精神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对此，严复提出了一个总体原则：“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即以科学知识和精神提高国民智、德、力素质。其具体方法是：在鼓民力方面，除了要继承中国固有的“武事”，以“鼓民血气”之外，还要采用西方“医学所详”的科学方法，养男女之生，健后代之种。在开民智方面，要通过“讲西学”对国民传授生产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教育方法，“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理，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养成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在新民德方面，要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阐扬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观念，以代替和改造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力图划清“小己（个人）国群之分界”，以此构建一种以尊重和实现个人“说实话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群体观念。^②

梁启超也提出了同样的新民方法。他解释“新民”的含义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既要改造原有的民力、民智、民德，使之为新，更要补充新的成分。对于改造旧的，要把中国固有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使之“日新”。对于补充新的，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③

上述说明，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已有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并广为宣传，还开始了一定的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为此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铸造、五四

①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63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

② 《严复集》，第514、28、29—30、132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6页。

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活动所继承发展，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工程。

三 戊戌维新与现代团体的产生

现代性社会团体是社会建构方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维新人士不仅通过组建各种学会活动开启了中国人自建现代性社团的先河，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以阐释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学理论。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但是对此作比较系统的介绍则是在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在他的《原强》、《天演论》、《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等文章和译著中，阐释了不少西方社会学中的有关集群、结社、治国的理论。在《原强修订稿》中，他依据斯宾塞的群学理论，首次提出了群学的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含义，并指出集群是人之天性，是人赖以生存和国家政治得以完善的基础，“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①。在《天演论》中，他介绍了进化论原理，并进而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在，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②，强调了建立团体运用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群学肄言》则直接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如群学的意义和方法、“物竞天择”、“么匱”（个体、个人）与“拓都”（全体、国家）的关系、“群”的含义等；并在其自作序言中指出了人民集群的必然性、普遍性，以及入群与团体（社会）的区别、团体与国家的区别、团体的特征。他说：“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

① 《严复集》，第16页。

② 严复译《天演论》，导言十三案语。

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民聚而有所部勒（组织）祈向（取向）者曰社会。”“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①

这些群学理论成为维新人士组建团体的重要指导思想。随着《天演论》译稿的流传，维新派的群学理论渐趋完善，对组建团体重要性的认识日渐增强。如谭嗣同的《仁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康有为和严复、谭嗣同的群学思想的影响下，“作《说群》十编，一百二十章”^②，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群学理论。

第一，明确了群（群体）与学的关系。他们认为，要维新必须要开发新型人才，要开发新型人才就必须传播和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而传播和学习科学知识的最好方式就是结群集会。康有为说：“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③因为“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④；合群而学还可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梁启超也认为，所以要合群而学，是因为“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必智，反之则愚”^⑤。

第二，明确了群与强的关系。他们懂得了合群能够增强生存和竞争能力的道理。康有为认为：“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⑥，而中国则“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他还指出：世界上“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合众人之

① 《严复集》，第123、126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页。

③ 参见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④ 参见康有为《强学会叙》，《不忍杂志》第8册，1913年10月15日。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2页；文集之四，第10页。

⑥ 《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386页。